

解密

三十八度線

中蘇朝的合作與分歧

T20381

沈志華 著



解密山三十八度線

——中蘇朝的合作與分歧

沈志華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解密三十八度線——中蘇朝的合作與分歧 /
沈志華作. -- 臺北市：震撼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易可數位行銷發行, 2013.10

面；公分

ISBN 978-986-5870-69-0(平裝)

1.中俄關係 2.外交史 3.韓戰

644.8

102017665

解密三十八度線——中蘇朝的合作與分歧

作 者 / 沈志華

責任編輯 / 苗龍

發行人 / 謝俊龍

出 版 / 震撼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06台北市安居街118巷17號

Tel : (02)2364-0872 Fax : (02)2364-0873

經銷商 / 易可數位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231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235巷6弄3號5樓

Tel : (02)8911-0825 Fax : (02)8911-0801

出版日期 / 2013年10月

訂 價 / 新臺幣480元

本書原由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以書名《朝鮮戰爭再探——中蘇朝的合作與分歧》出版，現經由原出版公司授權震撼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在臺灣地區獨家出版、發行本書中文繁體字版。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 978-986-5870-69-0

Printed in Taiwan

目錄

序 陳兼 1

第一章 重溫遠東夢：蘇聯在亞洲的目標及政策趨向

- 一、蘇聯戰後的對外政策及其轉變 18
 - (一) 斯大林對共產國際的態度變化 19
 - (二) 盟國開闢第二戰場與蘇聯解散共產國際 24
 - (三) 雅爾塔體系下的蘇聯“聯合政府”政策 29
 - (四) 伊朗危機和土耳其危機 40
 - (五) 冷戰的緣起 44
- 二、蘇聯對朝鮮半島的戰略和策略 49
 - (一) 以北緯三十八度劃分托管界限 52
 - (二) 金日成初出茅廬 59
 - (三) 莫斯科外長會議確定建立統一的朝鮮臨時政府 63
 - (四) 美蘇在聯合委員會中的對抗與朝鮮南北政權的分立 69
 - (五) 斯大林對簽訂朝蘇同盟條約不感興趣 75
- 三、蘇聯在中國的目標和政策轉軌 78
 - (一) 戰後蘇聯對華政策始終不離的兩個目標 78
 - (二) 中共與蘇聯之間互不協調互不信任的關係 82

- (三) 毛澤東曾寄希望於來自美國的幫助 85
- (四) 控制中國東北構成蘇聯與中共關係的戰略基礎 90
- (五) 毛澤東頂撞斯大林堅決反對國共和談 95
- (六) 中共與蘇聯戰略合作架構的初步形成 97

第二章 走近莫斯科：中蘇同盟的建立及其內在衝突

- 一、中蘇同盟條約談判的艱難歷程 102
 - (一) 新疆問題、蒙古問題和東北問題 103
 - (二) 舊的中蘇同盟條約和新的中蘇同盟條約 107
 - (三) 莫斯科的空氣顯得凝重而緊張 112
- 二、斯大林被迫再次做出重大讓步 116
 - (一) 中蘇關係悄悄地開始升溫 117
 - (二) 蘇聯起草的協定草案新瓶裝舊酒 119
 - (三) 中國提出關於東北問題的全新方案 125
 - (四) 美國是“斯大林與毛澤東交往中無形的第三者” 131
 - (五) 周恩來再次提出外蒙獨立的問題 135
- 三、中蘇同盟面對現實利益的考驗 137
 - (一) 莫斯科在中蘇外交談判後期斤斤計較 138
 - (二) 蘇聯援助中共解放台灣的海空裝備遲遲不到 142
 - (三) 面對中蘇同盟條約美國開始改變對台政策 149
 - (四) 美國全面援助蔣介石台灣政權的政策定型 156

第三章 越過三八線：斯大林決定為金日成開放綠燈

- 一、金日成統一朝鮮半島的堅定信念 160
 - (一) 蘇聯最初對北朝鮮組建軍隊態度消極 161
 - (二) 朝鮮南北雙方在三八線的緊張對峙 165
 - (三) 林彪部隊中的朝鮮族官兵秘密入朝 170
 - (四) 李承晚叫嚷要對北朝鮮發動進攻 174
 - (五) 斯大林和毛澤東不贊同金日成主動進攻 177
- 二、莫斯科背著毛澤東做出了新決定 183
 - (一) 斯大林突然表示支持金日成發動戰爭 184
 - (二) 斯大林與金日成背著中國舉行秘密會談 190
 - (三) 金日成對蘇聯人謊稱毛澤東已同意他的計劃 195
 - (四) 金日成和斯大林“綁架”了毛澤東 200
 - (五) 金日成於6月25日發動全線進攻 203
- 三、斯大林同意發動戰爭的決策動機 208
 - (一) 並非是艾奇遜給金日成開放了“綠燈” 208
 - (二) 蘇聯缺席安理會只是一時手足失措 211
 - (三) 蘇聯的冷戰戰略真的是要發動世界革命嗎 217
 - (四) 斯大林並無意推廣中國革命的經驗 220
 - (五) 斯大林的根本目標是維護蘇聯的亞洲戰略利益 227

第四章 跨過鴨綠江：毛澤東力排眾議決心出兵朝鮮

- 一、斯大林一再阻止中國參與戰爭 234

(一) 美國的參戰令莫斯科和平壤感到意外	236
(二) 毛澤東主動提出中國願派兵入朝作戰	239
(三) 斯大林對中國出兵的問題一直拒不回覆	243
(四) 蘇聯的戰鬥機沒有出現在平壤上空	250
(五) 莫斯科對中國出兵的態度終於明朗	254
二、中國出兵朝鮮決策的曲折過程	260
(一) 關於北京致莫斯科兩封電報的謎團	261
(二) 毛澤東並沒改變“對朝鮮問題的最初立場”	268
(三) 林彪是否稱病拒絕掛帥出征朝鮮	272
(四) 周恩來和林彪訪蘇的秘密使命	280
(五) 黑海會談的結果是決定放棄北朝鮮	289
(六) 毛澤東說：“就算打不過美國也要打！”	296
三、毛澤東決意入朝作戰的深層考慮	302
(一) 中國出兵朝鮮決策過程的六個階段	303
(二) 關於毛澤東堅持出兵決策動機的推斷	306

第五章 邁上新台階：中蘇同盟在戰爭中鞏固和發展

一、在朝鮮上空作戰的蘇聯航空兵	316
(一) 斯大林終於決定派蘇聯空軍參加朝鮮作戰	317
(二) 蘇聯空軍在朝鮮上空築起“米格走廊”	320
(三) 華盛頓和莫斯科共同保守蘇聯空軍參戰的秘密	323
二、戰爭期間蘇聯對中國的全面援助	326
(一) 蘇聯為戰爭提供了幾乎全部軍事裝備	326

(二) 斯大林對中國經濟恢復的全面幫助	328
(三) 蘇聯大力支持中國推進全面的工業化	334
(四) 蘇聯專家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337
三、面對中朝分歧斯大林的“一邊倒”	342
(一) 中朝關於軍隊指揮權問題的分歧	343
(二) 彭德懷激烈反對金日成立即南下的主張	352
(三) 中朝在鐵路管理權問題上的爭執	358
(四) 中朝關於停戰談判的方針爭論不斷	364
(五) 中朝對於簽署停戰協定的不同思考	371
(六) 斯大林的繼任者改變了關於朝鮮戰爭的方針	376
(七) 斯大林倒下去了，站立起來的是毛澤東	383

餘 論 一場早該結束的戰爭

一、印度政府的調停嘗試與美國的反應	395
二、毛澤東決定打過三八線再談停火問題	397
三、十三國停火建議與中國的最初回應	401
四、中朝聯軍越過三八線與聯合國的停火議案	406
五、中國拒絕聯合國議案及其決策考慮	410
六、中國錯失了停戰談判最有利的時機	414
七、本來可以避免付出的沉重代價	419

後 記

序

美國康奈爾大學 陳兼

志華兄的又一本新著將要出版，並又一次囑我作序。這件事，我自知有力不從心之處，但從來就知道志華兄的脾氣與秉性，再加上我們之間三十多年的友誼，於情於理是絕沒有推脫不就之可能的。於是，勉為其難之下，便寫了下面這篇權作為“序”的文字。

每一本書（尤其是好書）的背後，大概都會有一段漫長的故事。志華兄的這本新著，也是如此。我與志華兄相交相知這麼多年，對這段故事自然也是知之甚詳，甚至自以為就是故事的一部分了。就借此次再為志華兄新著作序的機會，將這段故事以及閱讀志華兄新著的若干淺見混合在一起，與讀者諸君分享。

光陰如梭。回想起來，第一次同志華兄見面，竟已是如此久遠之前的事了，但當時的情景卻依然栩栩如生、歷歷在目。那還是 1981 年，我還是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世界現代史專業的研究生。深秋的一個下午，我同李巨廉、王斯德、潘人傑等老師和俞新天等同窗一起，到上海社會科學院參加一個關於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蘇聯史的討論會，重點是斯大林模式在蘇聯出現並確立的歷史評價問題。在會上唱主角的是一些老一輩學者，在文革後學術界“未暖還寒”的氣氛下，他們顯得心有餘悸，說的話也了無新意，我拚命地控制著不讓自己打瞌睡。這時，一位從未見過的年輕人走了進來，並在聽了幾個人的發言後開始發表評論。聽他自我介紹道，他的名字叫沈志華，從北京來，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史研究所的研究生。他的發言直截了當地對斯大林時期蘇聯在政治體制和

經濟結構上高度集中的種種弊病提出了尖銳的批判，而且對各種事例和材料隨手拈來，講得有根有據。他的話不僅馬上便驅走了我的一切殘存的睡意，也讓所有的與會者都吃了一驚——畢竟，在當時的中國學術界，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仍然屬於不可觸及的“禁區”。聽著他的滔滔宏論，坐在我身邊的王斯德老師悄聲對我說：“他很有頭腦，看法很尖銳，但他太沖了，以後恐怕要吃虧的。”

對出席這次研討會的研究生們來說，沈志華立刻便成了我們的楷模。我們馬上邀請他到學校來聚一聚。他答應了。第二天，他來到了我們的宿舍，從中午時分開始，喝著廉價的啤酒，吃著從食堂裡打來的飯菜，從各自的學術興趣講到過去和當下的一系列“大問題”，一直談到了深夜。這一天，我們相見恨晚，成為朋友，甚至開始稱兄道弟。當時，我的腦子裡居然浮現出電影《卡薩布蘭卡》結尾時的那一幕，心中的感覺是，由此而開始的，是一段將會長久延續下去的友誼。

不料，就在志華兄離開上海後不久，我就失去了和他的聯繫。我給他寫過幾封信，除了最初的一封外，其他都如同泥牛入海，再無回音。1982年春的一天，我從我們的共同朋友劉昶兄處得知，他由於某種莫須有的“政治原因”而被逮捕了。在第一次見面後的十五年裡，我再也沒有見到過他。

1986年，我在華東師範大學教了四年書之後，來了美國，先是攻讀博士學位，然後又留在美國教書，但仍然經常回國，也偶爾會聽到關於志華兄的消息。他在八十年代中期獲釋放後，雖極力爭取，卻沒有能夠回到學術界，而是走上了下海經商之路。到了九十年代初，聽說他經商相當成功，成了“大款”。那時，我的感覺是，我們已經走上了不同的生活道路，也許再也沒有什麼見面的機會了。

1995年秋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了一位自稱是沈志華朋友的人的電話。他問我，是否還記得沈志華。“當然記得，”我答道。他告訴我，沈志華已經“上岸”重返學術界，並希望和我恢復聯繫。我就此和志華兄重新開始了通信聯繫，

從中得知，他用過去十年間經商賺來的錢在北京成立了一個“東方歷史學會”，打算以蘇聯史和國際冷戰史（包括朝鮮戰爭史）為重點，從事學術研究和寫作。我也向他介紹了自己的近況，並相約在北京見面。

1995年聖誕日那一天，我到達北京，志華兄在首都機場接我。儘管我們已經有十幾年沒有見面了，但我們幾乎同時便從一大堆人中認出了對方。他隨後開車送我去位於北京市中心的王府井松鶴賓館，並也在那兒住了下來，我們幾乎談了一個通宵，直到黎明時分。他只是簡單地講述了坐牢的經歷。那是一樁錯案，他在勞改營被關了兩年，其間拚命讀書，還在他的碩士論文的基礎上寫出一部關於蘇聯新經濟政策的專著。不過，對他來說，重要的並不是追憶和感歎那已經逝去的過去，而是如何抓住現在和面對未來。他說，我們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了。於是，我們的交談集中到了各自的研究課題和計劃上來。他告訴我，自己之所以要從事國際冷戰史和蘇聯史的研究，是因為這方面文獻資料甚多，國內學界的相關研究卻依然十分薄弱，有太多的歷史真相需要以“撥亂反正”的態度來揭示，而每一個這方面的課題對於現實又“太有借鑒意義了”。他剛剛去了一趟俄國，主要是從事檔案研究和資料收集工作，複印攜帶了大批原始檔案文件回國，並已經組織了一批退休學者和翻譯工作者，從事翻譯、編輯、出版蘇聯檔案資料的龐大工程（後來，歷經波折，總共34卷的《蘇聯歷史檔案選編》最終於2002年出版）。志華兄在交談中還提到，他以這些年來披露的中方文獻資料和新近開始解密的俄國檔案資料為基礎，完成了一部關於朝鮮戰爭起源的專著，將在香港出版。恰好當時正值我的第一本英文專著《中國走向朝鮮戰爭之路：中美對抗的形成》出版不久，於是，我們的交談又集中到涉及朝鮮戰爭歷史的諸多問題上來。我們還談到了馬上要在香港大學舉行的“冷戰與亞洲”國際學術討論會。我們都將參加這次會議。

就是在這一背景下，我們開始了第一個“合作項目”：搞清楚1950年10月2日毛澤東給斯大林的電報為什麼會有兩個不同版本？我告訴志華兄，我回

國前參加了在華盛頓威爾遜中心舉行的一次關於朝鮮戰爭歷史的小型研討會。會上，一位俄羅斯青年學者以新近解密的一份俄方檔案文件為依據，對中方在八十年代便解密發表的毛澤東於1950年10月2日發給斯大林的一份電報的真實性和可靠性提出了質疑。根據中方早於八十年代初便公佈的這份文件，毛澤東通知斯大林，中國領導層已經做出了出兵朝鮮的決定，並列舉了為什麼必須出兵的各種理由。從八十年代末起，包括我本人在內的許多學者便開始引用這份重要電報。我在《中國走向朝鮮戰爭之路》一書中，也在論證中國出兵的原因和過程時將這份電報放到了極為重要的地位。然而，根據俄方新近解密的檔案文件，毛澤東於1950年10月2日在同蘇聯駐華大使羅申的談話中，要他轉告斯大林，中國領導層還沒有做出出兵的決定，並列舉了為什麼難以達成出兵決定的原因。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在威爾遜中心的會議上，那位俄國學者提出，中俄兩份文件相互矛盾抵觸，但根據其內容判斷，只可能有一份文件是真實可靠的。而他手中便持有俄方原始文件的複印件。相形之下，中方的電文是在《毛澤東軍事文選》和《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內部發表”的，作為研究者，我們並沒有看到文件的原始文本。那位年輕氣盛的俄國學者甚至提出，不能排除中方公佈的毛澤東電文是偽造的可能性。當我向志華兄陳述這一故事後，他立即表示，將同中央文獻研究室和中央檔案館聯繫，請求他們拿出中方文件的原始文本，並就這一“文本衝突”的事件做出相應的解釋。

兩個星期後，我和志華兄都出席了在香港大學舉行的“冷戰與亞洲”的大型國際學術討論會。志華兄已經帶來了中國檔案部門的回應：中方檔案中確實保存有毛澤東親自起草的致斯大林電文的原始件，但不排除電文並沒有發出去的可能性。志華兄在會議上代表中國檔案部門就此作了說明。志華兄和我以及與會的楊奎松兄等其他國內學者也就此事進行了討論和分析。從當時中共領導層尚未就中國是否應當出兵的問題達成共識，而斯大林又沒有在對中國入朝部隊提供空中支援的關鍵問題上做出承諾的情況來看，毛澤東在起草這份電報後

確實很可能沒有發出，而是通過同蘇聯駐華大使羅申的談話，向斯大林送去了“尚未作出兵決定”的模稜兩可的信息，他這樣做，很可能是為了加強北京方面同莫斯科討論戰時合作與分工問題時討價還價的實力地位。會後，沈志華就此寫成了一篇論文，由我翻譯成英文，發表在華盛頓威爾遜中心出版的《國際冷戰史公報》上。

這件事，一直到一年多之後才有了最後的結果。1997年夏天，我正在北京從事研究並與志華一起籌備當年10月將在當代中國研究所舉行的中蘇關係史國際學術會議時，接到了中央檔案館一位負責人的電話，要志華兄和我去一次。我們到那裡後，他交給了我們一份毛澤東1950年10月2日致斯大林電報的原始複印件（共9頁，其中涉及到毛對金日成提出嚴厲批評的兩頁未給我們，而只是將內容對我們做了口述）。這確實是毛澤東的手跡，由毛澤東親自起草。但電文的首頁沒有發報記錄。因此，幾乎可以肯定電文沒有發出。但它的內容表達了毛澤東在出兵朝鮮問題上的一些基本看法，這一點卻是沒有疑義的。

這件事對我們的影響是巨大的，因為它使得我們更加認識到在學術研究中對於檔案和其他資料不斷甄別和始終持批判性態度的重要性——而在中國的學術環境下，這一點尤為重要。

當時，正是國際學術界“冷戰史新研究”的學術潮流湧動、關於朝鮮戰爭的探討也日益再度引起人們重視的時候。作為冷戰時期的第一次大規模“熱戰”，關於朝鮮戰爭的研究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曾有過一段“興旺”時期，但在七八十年代，這一戰爭本身已較少受到國際學術界的關注，以至於被一些學者稱為“被遺忘的戰爭”。隨著全球冷戰走向終結，尤其是隨著冷戰結束前後中國以及前蘇聯相關文獻資料的大量解密或披露，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從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起，包括我本人在內的一批當時仍屬於“青年學子”的中國留美學界，也主要以中國方面新近解密公佈的資料為依據，發表了一系列學術新論。除了我的《中國走向朝鮮戰爭之路》之外，張曙光先後發表了《邊

制和戰略文化：1949-1958 年的中美對抗》和《毛澤東的軍事浪漫主義：中國和朝鮮戰爭》；翟強發表了《龍、獅子和鷹：1949-1958 年的中英美關係》，盛慕真發表了《對西方帝國主義開戰：毛澤東、斯大林和美國》，等等。在這些論著中，關於朝鮮戰爭的研究都佔據了重要乃至中心地位，但遺憾的是，其中很少甚至完全沒有引用俄國方面的文獻資料。

1994 年，俄國總統葉利欽訪問韓國，將新近解密的一批關於朝鮮戰爭的文獻資料轉交給韓國總統金泳三，以此為契機，國際學術界關於朝鮮戰爭歷史以及更為廣義上的國際冷戰歷史的研究形成了一個新熱潮，引人注目的新論著不斷出現。與此同時，俄國解密文獻在為學者們提交了新的“彈藥”的同時，也對他們提出了如何更為全面並富有批判性地引用文獻資料的挑戰；而從一個更為深入的層面來看，則是提出了如何重新看待全球冷戰本身以及構成其重要部分和“轉折點”的一系列歷史事件（朝鮮戰爭正是其中最為重要的之一）的問題。

正是在此背景下，志華兄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起發表了他關於朝鮮戰爭歷史研究的第一批論著的。憑藉著他自從事歷史研究起便具有的一種批判性視野，再加上他長期以來從事蘇聯歷史研究而形成的深厚積累（即便在他下海經商期間，這仍然是他的“業餘愛好”），以及對於有關朝鮮戰爭的俄文新資料的廣泛掌握，他在朝鮮戰爭研究這一課題上的著述從一開頭便出手不凡，然後更是一發而不可收，連續發表了一系列在國內和國際學術界影響極大的論文和專著，尤其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出版的《朝鮮戰爭揭密》（亦即他在 1995 年聖誕夜我們長談時提到的那本書）、《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中蘇同盟與朝鮮戰爭研究》等專著和論文集，對朝鮮戰爭歷史乃至更為廣泛意義上的國際冷戰史展開了一系列研究。幾年之間，他便成為中國及國際學術界這一領域的一位公認的“大家”。

志華兄關於朝鮮戰爭的所有論著，同他在其他課題上的論著一樣，都是以極為扎實的第一手資料的發掘和把握為基礎而完成的，並都具有多邊、多層面

以及多語種檔案資料研究的鮮明特徵，而這正是“冷戰史新研究”（The New Cold War History）學術新潮流的一個基本特點。在他這些年來從事朝鮮戰爭歷史研究的過程中，他鍥而不捨地一再回到俄羅斯以及一些前蘇聯集團的成員國從事細緻深入的檔案收集工作，並在美國國家檔案館、國家安全檔案館、國會圖書館、威爾遜中心、胡佛研究所等地從事檔案研究，從而形成了一個不斷更新的關於朝鮮戰爭歷史的國際檔案及其他文獻的資料庫。與此同時，他也以一種“上窮碧落下黃泉”的精神收集研究中國方面關於朝鮮戰爭的各種文獻資料，除各種公開或內部發表的文件集、資料彙編、專著和回憶錄外，他還充分使用了外交部、軍委、國防部、鐵道部、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黨史研究室、中央黨校、當代中國研究所以及包括東北三省在內的各省市檔案館的各種材料，也大量利用了台灣“國史館”及其他檔案館和圖書館的材料文獻資料以及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資料中心所藏資料。此外，他還以廣泛深入的檔案研究為基礎並與之形成互補，對當事人作了大量乃至反覆的訪談。事實上，他對當事人的訪談，常常也成為一種檔案資料與親身經歷之間通過他們而進行的一種“對話”。出於對他的信任和尊重，許多當事人（如曾任中國駐朝鮮使館政務參贊及臨時代辦的柴成文、曾任志願軍總部參謀並隨彭德懷工作的王亞志等）在訪談後將還自己保存的筆記和相關文獻提供給他使用。這在中外學者中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

這裡有一段志華無意中提及的“掌故”。熟悉志華兄的人都知道，他這個人嗜酒如命，年輕時的酒量更是少有能與之匹敵者。這竟然在他到俄國從事檔案研究時派上了用場。他初到俄國時，據他自己說，“連檔案館的大門朝向都摸不清”，更不要說種種規矩和門道了。後來，通過同俄國學者一次次“碰杯交歡”，相互間產生了友誼及信任，他們為他提供了不少幫助。結果，他飲酒的嗜好，竟成了打開俄國檔案館大門的一塊“敲門磚”。

還必須提及的是，志華兄每天凌晨三、四點起床，伏案工作（主要是寫作）達十五六小時。最多就是在中午後睡一個短則一二十分鐘，長則不超過一小時

的午覺。（他的一個大本事，就是能夠在想要睡覺時倒頭便能呼呼大睡。）二十年如一日，天天如此。志華兄今天的“著作等身”，就是如此而來的。

現在擺在讀者面前的這本書，從形式上來看，是志華兄於上世紀九十年代末發表、又於2003年和2007年修訂過的《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一書的修訂版。但若同本書十幾年前的初版（或“原型”）相比較，這一版本的變化是巨大的，甚至可以說，經志華兄的全面修訂、改寫後，這實際上已是一本新書了。志華兄以一種更為宏大的歷史視野以及更為深邃的分析力度，對照解讀並系統引用了過去十幾年間陸續解密公佈的俄國檔案、中方不斷披露的相關文獻資料，以及包括美國、韓國文獻在內的其他許多新資料（或在志華的著述中先前曾引用過、但又通過與新資料的對照而重新解讀的“老資料”），從而寫出了這樣一部以戰爭起源為重點的關於朝鮮戰爭的更為全面的歷史敘事，其中充滿新論。以我之淺見，本書至少在五個方面提出了具有全局性意義的新看法。

第一，關於朝鮮戰爭爆發前後斯大林及蘇聯的大戰略、遠東政策及對華和對朝鮮政策的討論，同志華兄先前的論述相似，仍然是本書的論述重點。但他在指出戰後斯大林的遠東戰略同沙俄時代相關政策之間的歷史延續性時，更為突出地強調了斯大林將維護“雅爾塔體系”的地緣政治結構當作蘇聯戰後東亞戰略制訂的基本準則；在揭示斯大林的遠東政策同俄國的傳統國家安全大戰略之間的繼承關係時，他通過對各種資料的認真比照和甄別後提出，在斯大林戰後處理遠東問題以及制定對華和對朝鮮政策時，其“重中之重”就是竭力為蘇聯保有在遠東的不凍港和出海口。從斯大林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在戰略和政策的層面具有“牽一髮而動全身”意義的關鍵性問題。但由此而產生的，則是蘇聯整個冷戰戰略和遠東戰略結構本身在地緣政治訴求和意識形態話語之間的高度緊張。這一看法，成為本書的一個基本的邏輯出發點。不管國內外學界對這一看法會有何種回應（可以想見，對於這樣一個見仁見智的大問題，肯定會有人有不同意見的），但鑒於它本身顯而易見的重要性，它是人們在自己的相

關研究中必須予以直面而難以迴避的。這豈不正是一本好的學術論著的標誌之所在，同時也正是志華兄“大家筆法”之體現？

第二，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中蘇關係的演變以及中蘇同盟形成及其內在矛盾的分析，本書亦提出了極為重要的新看法。志華兄在論及毛澤東訪蘇及中蘇同盟形成時指出，斯大林從在東亞維護雅爾塔格局以及蘇聯從中獲得的既得利益的基本考慮出發，本來並不願意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簽訂新的同盟條約，並以之取代 1945 年蘇聯與當時的中國國民政府所簽訂的舊約。然而，由於毛澤東對這個問題抓住不放，再加上國際局勢的壓力，斯大林反覆權衡利弊之下，最後向毛澤東作了重大讓步，同意簽訂新約。此後，在關於條約內容的談判中，斯大林又再次做出讓步，同意最終放棄蘇聯在中國的勢力範圍（尤其是對於旅順港的直接控制）。由此而導致的，則是中蘇關係所面臨的一種充滿弔詭意味的前景：當中蘇新盟約簽訂之時，從表面上來看莫斯科與北京之間的戰略關係似乎達到了一個歷史的高點，但實際上這卻是毛澤東將斯大林逼到牆角的結果，而兩國關係實際上也推到了某種潛在危機的邊緣。

志華兄的這一看法之所以重要，在於它將中、蘇兩國以及毛澤東和斯大林對於戰後國際格局的極不同的態度突出地展現在讀者面前——而在志華兄看來，這不僅對理解當時蘇聯和中國整個對外政策的基本走向以及朝鮮戰爭的起源，也對中國入朝參戰歷史的整個評價，都具有關鍵性的意義。要而言之，根據志華兄的分析，在中蘇兩國通過這樣的途徑形成同盟關係後，斯大林已產生了對於毛澤東及中共的極大的不信任，並使得中蘇同盟從一開始就是建立在極不穩固的基礎之上的。如果毛澤東和中共還想將“一邊倒”當作新中國整個內外政策的基石之一的話，那麼，重新獲得斯大林的信任並進而獲得來自蘇聯的各種支持和援助就是必須走出的一步。後來毛澤東和中共領導層的入朝參戰決策固然有著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但追根溯源，則同斯大林在中蘇條約問題上對毛澤東的重大讓步是分不開的。對於志華兄的這些新論，中國及國際學術界